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编译出版的中国化特征^{*}

● 黄 刚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三件大事，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编译、《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出版发行都表现出鲜明的中国化特征，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编译出版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和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中分别指出：“《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1]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命运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及传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编译、出版、发行和传播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新中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译和出版事业进入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期，也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中国化特征，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的结合。

一、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编译的中国化特征

早在1938年，针对党内存在的“洋八股”、“空洞抽象的调头”和“教条主义”等现象，毛泽东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2]这首先要求马克思主义著作必须带有中国的特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文献基础，这必须把

以欧洲语言为表现形式的马恩列斯著作作用中华民族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之在语言形式上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的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并满足广大干部群众渴望学习马列主义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49年成立了中央俄文编译局并在宣传部设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以加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53年，经毛泽东亲自批示，中央决定在合并以上两个单位的基础上成立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作为全国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心，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1950年，人民出版社成立，并将马恩列斯与毛泽东的著作作为应该集中主要力量首先出版的书籍，这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随着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事业有了集中领导和统一规划，其首要任务是尽快翻译出版《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经过努力，这三大全集分别于1958年、1959年、1985年全部译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经济、政治、哲学、

^{*} 本文系2011年北京市教委共建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实化、深化、细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军事等方面的单行本或专题言论集也在这一时期陆续开始翻译、出版,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论印度》、《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等。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要有汉语版本,还应该少数民族语言版本,以便于少数民族人民直接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学习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分别于1953年和1955年成立了民族出版社和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这两个机构在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民族语言翻译出版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先后用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翻译出版了大量马恩列斯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编译具有明显的中国化特征:

1.语言上的民族性。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语言形式上的要求不仅是对马恩列斯经典著作在语言文字上的转换,还应该是在历史传统、民族文化、思维习惯、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对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德文和英文为主,还有一些是用法文、意大利文等欧洲语言写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要是依据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照德文版翻译的,《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也是依据当时的俄文版翻译的。德文、英文、俄文等语言与中文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区别,更表现为文化与传统上的差异。因此,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翻译不仅要用规范化的汉语(当然也包括少数民族语言)把经典著作准确而“等值”地表达出来,还要体现出民族的特色和中国的特性,显示出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力求通俗易懂。1957年,贺麟在谈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体会时认为,翻译工作的“特殊意义尤其在于使思想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中国话,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外国学问成为中国化,在中国生根”^[3]。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一个很大优点就是

“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比较好地突出了文采,其中一些精彩的、经典的表述打动了无数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这一点是中文第二版要努力学习和传承的”^[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种将科学的精确性和高度的艺术性结合起来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翻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2.内容上的完整性。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不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有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固定的基本原理,也表现为在形式上支撑其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的原著是一个完整的文本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体系能否得到完整的翻译、传播和介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能否完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在中国得以传播,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多是通过意译、摘译、转译或转述而传播的,不少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如《社会主义浅说》、《苏俄劳农政府成立之经过》、《共产主义ABC》等都是从日本介绍到中国的,并且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通常是依据革命运动和客观形势变化而有所侧重地通过选择一定的单行本、节选本或单篇文章的形式进行翻译、传播和介绍的,这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共产主义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正式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此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运用已不能仅仅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某本著作或某篇文章的认识和理解,而应以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为国家建设提供理论基础,这也对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编译局在较短时间内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共计5000余万字,包含了全部著作、手稿、书信等丰富资料,这一较为完整的马恩列斯著作中文全集译本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整体性、系统性的文献基础。

3.理论上的权威性。“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5]因此,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既不能

离开原著也不能超过原著，要把原文的意思用中文“复制”出来。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将主要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作为文本依据，这对经典著作翻译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提出了严格要求。为此，在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编译中，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翻译校阅委员会并制定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校审出版程序”。同时，翻译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行为，经典著作翻译者既要精通语言，又要精通专业，不仅要对原著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进行准确翻译，还要注意其思想、观点和提法，掌握原著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坚持翻译与学习和研究相结合，通过对原著的深入研究确保翻译的“意思正确，文字通顺”，为读者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最权威的文本依据。

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本根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源泉。新中国成立初期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提供了更具中国特色、更加充分、更加完整、也更加可靠的文献依据，推进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二、《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和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第一个理论成果，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党中央从延安时期起就一直重视毛泽东著作的

编辑出版工作。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负责统一编选、注释和整理《毛泽东选集》。到1960年，编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著作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完成编辑出版工作，所选文章都经过毛泽东的修改、校阅和审定，并附有权威的题解和注释。在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同时，大量毛泽东著作单篇本、合编本也同时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毛泽东著作整理、出版和发行的鼎盛时期。

《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果汇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选集》是集中展现这一理论成果的文本载体，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一个缩影，全面反映了毛泽东思考、提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用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和正确理论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并且其中所编入的文章在词汇、语法、修辞、典故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和表率。《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不仅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范本，对推进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出版的中国化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征还表现在大量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不断出版发行，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强调要对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的教育。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群众的实际情况，工人出版社于1950年4月出版了艾思奇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一书，该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到1958年共发行上百万册。这本书以生动活泼、真实具体的形式在讲述社会发展史的过程中阐发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对

于清除唯心主义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时掀起了一场“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在马列学院授课期间完成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在这本书中,艾思奇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系统论述了本体论、认识论、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和唯物辩证法诸范畴,准确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196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由我国理论工作者编写的内容比较完整、体系比较严密、具有中国特色、密切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达在毛泽东的提议和委托下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196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完成写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本书于1978年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唯物辩证法大纲》在充分吸取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突出地将哲学理论与哲学史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作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唯物辩证法大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编纂史上的精品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中国青年出版社还于1955年和1956年分别出版了冯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前者用通俗的语言阐明“真理和智慧”、“真理和谬误”、“真理和规律”、“真理和行为”等问题,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世界观、辩证法等基本原理;后者是专为青年人写的哲学小册子,对青年人进行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现了明显的中国化特征:

第一,现实化。将理论联系实际作为基本的编写原则,深入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关注中国的形势发展并结合新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二,科学继承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成分。对中

国古代哲学家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哲学思想和表现形式都有所反映并对其进行了辩证分析,提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水平。

第三,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统一起来,充分吸收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著作中的思想,用毛泽东哲学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第四,大众化。这是这一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最明显特征。基于当时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理论现状,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必须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由浅入深的形式来阐述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深入而全面的中国化,紧密结合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科学继承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成分,充分吸收毛泽东哲学思想,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实现大众化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所编译的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和出版发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都带有鲜明的中国化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第1卷. 人民出版社, 1995: 256, 266.
- [2] 毛泽东选集 [M].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91: 534.
- [3] 贺麟. 学习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体会 [A] //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C]. 人民出版社, 1983: 175~176.
- [4] 衣俊卿. 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1 (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 第25卷. 人民出版社, 1974: 26.

(本文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